

# 喜迎二十大

上接 A5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相互叠加。在这样一个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把防范风险摆在突出位置,着力破解各种矛盾和问题,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事实上,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论述中,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是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在促进金融更好为实体经济服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过程中确保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同时,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式,《纲要》中明确阐述了“要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稳步实现宏观杠杆稳定和逐步下降”。

早在2018年3月,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召开银行保险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就将降杠杆作为了监管的一项重要工作。郭树清表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有序推进降低企业杠杆率、拆解影子银行、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遏制房地产泡沫化倾向、配合整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工作,加强对各类风险的防范和化解。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表示,高杠杆是宏观经济和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当下,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负债率仍然偏高,居民部门加杠杆速度过快,政府部门隐性债务大量存在。过高的杠杆率可能引发资产泡沫破裂,触发“明斯基时刻”,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所以,必须坚持去杠杆方向和总体要求不变,下决心将债务水平和杠杆率逐步降下来。

他认为,去杠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不可避免对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在信用紧缩阶段,迫切需要融资的往往是高风险企业。那些实力较弱、风险较高的企业,出现融资困难,进而退出破产清算,既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体现,也是结构性去杠杆的应有之义。只有适当收紧信用,倒逼金融资源从低效率的产业和企业退出,才能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才能真正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对于结构性降杠杆的工作重点,董希淼称仍然是国有企业。他认为,针对国有企业应建立健全企业债务风险防控机制,以强化资本管理和风险管控为准绳,合理确定业务发展规模和速度,推动国有企业形成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要通过严格的财务制度和资本金约束,推动国有企业聚焦主业,做强主业,退出缺乏竞争优势的非主业领域及产业低端环节,严格控制增量债务。

2022年3月,郭树清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工作成效时称,2021年,重点领域风险持续得到控制,宏观杠杆率下

降了大约8个百分点,金融体系内的资产扩张恢复到较低水平,再次回到了个位数。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张伟表示,自2017年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增幅总体稳定,杠杆率年均增长约4.8个百分点,比2012至2016年年均增幅低8.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企业部门、住户部门宏观杠杆率都保持稳定。其中,2017至2019年,企业部门杠杆率稳定在152.2%左右,央企平均资产负债率已由2017年的68.1%降至2020年末的64.5%。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党的十九大确定的三大攻坚战之首,其重点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近年来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取得阶段性成果,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任重道远,仍需坚持不懈。

按照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战略部署,对于目前存在的金融风险,一定要胸中有数,未雨绸缪,密切监测,准确预判,有效防范,不忽视一个风险,不放过一个隐患,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位置,着力加强风险源头管控,完善金融安全防范和风险应急处理机制。

自2017年以来,银保监会对金融领域的乱象整治持续高压态势,组织开展“三三四十”等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金融业资金脱虚向实,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能力不断提升。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8年间,银保监系统的行政处罚决定超过1万份,罚没金额50多亿元,超过了之前十年总和。

2020年6月,银保监会对乱象整治开展了“回头看”,并再次强调了监管“长牙齿”,对违规行为加大震慑力度。据官方统计数据,2020年全系统共作出6581件行政处罚决定,处罚银行保险机构3178家次,覆盖各主要机构类型,处罚责任人员4554人次,作出警告4277家/人次;罚没合计22.75亿元;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19家次,责令停业整顿2家次,限制业务范围4家次,吊销业务许可证2家,取消(撤销)任职资格161人次,禁止从业312人。

张伟表示,金融系统处置一批高风险企业集团和高风险金融机构,维护了金融稳定。过去五年来,金融系统累计恢复与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600多家,包商银行、恒丰银行、辽宁城商行等部分中小银行风险得以处置或者重组。同时,影子银行规模持续压缩,加大核销银行业不良资产。截至2021年末,高风险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25万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85万亿元,不良贷款率1.73%,较2020年末下降0.11个百分点。

此外,张伟表示,在防范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风险方面,房地产合理融资需求得到满足,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根本扭转。尽管当前我国房地产业处在深度调整期,但随着房地产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因城施策效果不断显现,房地产市场不再是短期刺激经济的工具和手段,房地产市场整体保持平稳运行。

他认为,尽管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当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未来一段时期还会出现新的挑战,关键在于集中精力办好自己事情,关注宏观杠杆率抬升、债券市场风险、房地产市场外溢风险等。

## 以稳求进 以进固稳 ——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稳中求进,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工作总基调。在201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纲要》指出,稳是全局,关键是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当前,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要放在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

在推动经济工作中,还要坚持系统观念。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纲要》指出,要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运用辩证法,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提高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能力,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必须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目标是奋斗方向,问题是时代声音。《纲要》指出,在推动经济工作中,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

2019年7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曾鲜明指出,要处理好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的关系。加强和改进机关党的建设,既要以目标为着眼点,在统筹谋划、顶层设计上下功夫,以增强方向感、计划性;又要以问题为着力点,在补短板、强弱项上持续用力,以增强精准性、实效性。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影响,国际形势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纲要》指出,要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事情。这是把握发展机遇的关键,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强调真抓实干,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纲要》指出,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要一茬一茬接着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提到“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用“钉钉子”形象地描绘出了共产党人应有的科学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而实际上,早在2006年12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之江新语》专栏里发表的一篇名为《抓落实如敲钉子》的短文中形象地指出:“抓落实就好比在墙上敲钉子:钉不到点上,钉子要打歪;钉到了点上,只钉一两下,钉子会掉下来;钉个三四下,过不久钉子仍然会松动;只有连钉七八下,这颗钉子才能牢固。”

2013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中也指出:“我们要有钉钉子的精神,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

应该如何看待这些策略和方法?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

导师王在全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这些策略和方法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总结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指导我们各个方面的工作,当然也可以用于指导经济工作,这对于如何开展经济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党委书记、原院长邓纯东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成就和历史经验进行全面分析和系统总结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所蕴含的策略和方法,不仅是我国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也是我国推动经济建设,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推进整个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任务的一个总的方法论。

邓纯东表示,这些“策略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观点的创新和发展。

习近平经济思想既有“过河”的任务部署,又有“桥和船”的解决路径,也蕴含着科学思想方法。这其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无疑是最重要的方法论。

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稳中求进不仅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被提到了很高的层面。

刘伟认为,理解稳中求进,首先要理解其基本含义。稳首先是经济增长要稳,从宏观经济角度讲,经济增长速度要合理,速度控制要均衡,不能大起大落,既积极作为,又稳妥可行。在确定宏观经济指标的时候,首先就是要确定合理的增长区间。

所谓合理增长区间,一方面指它和其他宏观经济目标之间要均衡、相互衔接、不能严重脱节,另一方面指它和历史上前后的经济增长的变化速度比较起来,要符合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的趋势,围绕长期平均增长速度上下波动,但波动幅度不能太大。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与未来中长期目标相衔接,比如“十四五”时期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而稳中求进的进,刘伟认为主要指的是改,是深化改革。“我理解,进是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那么稳和进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纲要》指出,稳是主基调,要在坚持稳字当头、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进。

刘伟说,稳和进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稳就是静,改就是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也就是说,稳增长要有定力,改革要有秩序。

在刘伟看来,进要围绕一个中心——高质量发展,围绕一个目标——根本转变发展方式,贯彻一个理念——新发展理念,采取新的措施——新发展格局,实现新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转换。

“稳是在给进提供时间窗口,而进是为经济社会大局长期稳定创造基本条件。”刘伟说。

标,是以优化经济结构,深化经济改革为基础的速度,是速度与效益结合的稳健。”

“稳是基础,是前提,进才是目标,因为只有进取,才能继续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时,经济工作中的稳中有进,还要与党和国家其他各项工作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引下,要求政府部门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在制定土地调控政策、扶持产业发展、推动中西部发展等方面,都要贯彻稳中求进,而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邓纯东告诉记者。

伟大实践孕育伟大思想。实际上,稳中求进背后有我国成功的历史经验。

王在全表示,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就是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之路,没有采取休克疗法的激进式方式。实践证明,我们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习近平总书记把它概括为更加形象精准的稳中求进的工作方法。

那么,如何在经济发展中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刘伟认为,主要有三方面要点:一是在政策方面一定要强调协调,主要指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七个方面作出了部署,在此前“五大政策”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丰富。

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以及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

刘伟表示,上述七大政策之间一定要相互协调,避免政策上的“合成谬误”,这对经济发展总产能产生负效益,过去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是有。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时曾强调,政策之间不能强调不破不立,政策上要立后破。所以说,立后破政策非常重要。”刘伟说,党中央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政策之间要相互协调,不能单纯追求政策本身的目标,一定要让政策形成一个合成、聚焦。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做好“六稳”“六保”,稳住经济大盘,各种政策也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二是要加强统筹。刘伟认为主要包含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防疫、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环保双碳、统筹需求和供给这五方面维度。

刘伟说,国内国际循环不是封闭的,当前内需体系培育是主体,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是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国内国际各种风险叠加,要高度警惕和切实防范“灰犀牛”“黑天鹅”事件。而在统筹需求与供给方面,在中长期,应坚持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在当前突出强调的是培育内需体系,有针对性地应对三重冲击(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如果经济下滑,需求、供给会稳不住,那么从短期看,需求问题就上升为首要问题,而供给侧的问题成为了一个中长期问题。

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我们会发现,需求与供给是一个有机体,两者之间不能割裂。低水平、落后的经济结构,低质量没有安全感的供给,一定会促成需求的萎缩,让人们不敢消

费,不愿意消费。所以要统筹需求和供给。”刘伟告诉记者,其实,统筹好需求和供给就是统筹经济总量,即统筹经济增长和结构,不能割裂开。

三是做好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刘伟表示,其实这是我们这些年宏观调控的一个经验,即在反周期调节时要留有余地,为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宏观治理降低成本,创造条件。不要在经济冷的时候,让“大水漫灌”过于强烈,“大水漫灌”对短期渡过难关似乎有快速效应,但它容易形成大量的泡沫,到下一个经济周期,就会出现要消化这些泡沫等一系列问题。

同时,也要让现在的一些政策尽可能对下一周期的调节有直接帮助。

刘伟举例说,比如一些中长期的投资,地方债和专项债拉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一些中长期的金融投资投下去,对当期扩大内需有刺激作用,但可能当时刺激作用不大,几年之后它扩大内需的作用才开始更多地显现出来,这就是一种跨周期调节。

“所以,要坚持稳中求进,避免大起大落,在政策上特别是宏观政策上,一定要把跨周期调节和逆周期调节协调好。”刘伟说,我们的体制是有优势的,具有掌控宏观调控、宏观治理这种能力,如果单纯交给市场,很可能就会形成大起大落的格局,尤其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备的情况下,波动性会更大,尤其是市场主体不理智,不受市场硬约束或竞争力、创新能力不够的时候,靠低利率、放宽壁垒进入市场,容易形成泡沫。

“所以,当竞争市场主体质量不太好,市场竞争机制和秩序不太完备的时候,政府在宏观调控上更好地发挥作用尤其重要,能够处理好逆周期和跨周期的调节。”刘伟表示。

在王在全看来,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在多方面下功夫。

“我们下一步的着力点应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让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化国企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打好物质基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王在全说。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工作的科学行动指南。

习近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恢弘气魄、远见卓识、雄韬伟略,指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幸福的总方向、总路径、总方法。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真理,都在包括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当中。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习近平经济思想回答了中国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干这一重大问题,统一了思想,指引了行动。既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领航定向,也为当前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在推进实现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学习好、领悟好、运用好习近平经济思想,功在当代,利在千秋。